

中國詩學研究

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編

《文心雕龍》研究專

輯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學出版社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

中國詩學研究

第⑧

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专辑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诗学研究. 第8辑,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专辑 /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1.2

ISBN 978-7-81110-985-6

I. ①中... II. ①安... III. ①诗歌—文学研究—中国—丛刊 ②文心雕龙—文学研究—文集 IV. ①I207.22—55 ②I206.2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5031 号

中国诗学研究 第8辑

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专辑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

出版发行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)

www.bnupg.com.cn
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刷: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148mm×210mm

印张:17.25

字数:459千字

版次:2011年2月第1版

印次: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50.00元

ISBN 978-7-81110-985-6

责任编辑:卢 坡

装帧设计:王 芳 李 军

责任校对:刘园园

责任印制:陈 如 韩 琳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0551—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0551—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0551—5106311

《中国诗学研究》

学术顾问：傅璇琮 刘学锴 莫砺锋 钟振振

邓小军

编 委：丁 放 余恕诚 胡传志 潘啸龙

谢昭新 陈文忠 汪裕雄

主 编：丁 放

副 主 编：胡传志 潘啸龙 谢昭新

目 录

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篇属性之再检讨	周勋初 /1
重读《辨骚》、《通变》与《定势》，再议《文心雕龙》的宗旨与体系 ...	
.....	石家宜 /13
建基于根源之处 存在于语言家园	
——从《文心》之起结看刘勰持论的文化心态	孙敏强 /37
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篇新释	
——刘勰论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	赖欣阳 /48
论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篇与刘勰宗经思想之关系	陈允锋 /79
关于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对汉赋的一段议论	张国庆 /101
“宗经”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理论核心说质疑	周绍恒 /109
刘勰感物美学的“神思”意蕴	李 健 /120
《文心雕龙》的“象”范畴	杨星映 /133
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研究综述	李 婧 /142
《文心雕龙》美育思想探论	李逸津 /156
论刘勰“文心”说的理论支点和体系框架	张利群 /168
论《文心雕龙》的范畴特征	
——兼谈《文心雕龙》文论范畴的现代转换 ...	孙纪文 郭 丹 /184

“文笔之辨”与“纯文学”观念之建构	宋伟光 /197
论《文心雕龙》文学理论的谋略色彩	郭 鹏 /201
有关《文心雕龙》当代意义的一些思考	涂光社 /216
刘勰关于文学语言艺术的理论思考	蒋 凡 /228
简论刘勰文学史分期理念	任 慧 /253
刘勰诗学对《周易》的尊崇及其内在思想价值	李咏吟 /262
《文心雕龙》语境中的《诗经》与诗	
——兼及文学理论自觉问题	胡 海 杨青芝 /282
《文心雕龙》受晚出《古文尚书》影响之考论	
.....	汪 泓 张晓峰 /294
从《文心雕龙》的事、义论到《文选》的事、义观	吴晓峰 /310
从鲍照到沈约	
——《文心雕龙》没有注意到的诗歌主流	胡大雷 /324
论韩愈对《文心雕龙》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	雷恩海 /342
从刘勰的“感物吟志”说到许学夷的“情兴”论	方锡球 /356
文学时空中的“双子星座”	
——刘勰与姚鼐文学观念之比较	陈士部 /374
近百年大学讲坛上的龙学传播	李建中 陈永辉 /387
用心为文 以文育心	
——《文心雕龙》的人文观对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的启示	
.....	李映山 /397

《文心雕龙》对大学国文教学的几点助益	吕武志 /406
《文心雕龙》与现代大学教育	
——从南昌大学《校训》白鹿洞书院《学规》谈起	
.....	熊重生 /431
《文心雕龙》的“怎么说”与大学写作	李小兰 /442
效法《文心雕龙》，学点骈俪文风	隗 芾 /450
“龙学”里程碑	
——纪念牟世金先生逝世二十周年	戚良德 /456
又一部难能可贵的“文心学”力作	
——孙蓉蓉《刘勰与〈文心雕龙〉考论》读札	李金坤 /480
《文心雕龙》文本研究尚需深入	
——《文心雕龙译读》心得	李明高 /487
《刘子》作者问题研究述论	朱文民 /500
《刘子》与《易经》初论	游志诚 /525
《文心雕龙研究史论》略评	张 勇 /538
编后记	李 平 /543

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篇属性之再检讨

周勛初

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研究者中,对《辨骚》篇的归属问题认识上分歧很大。有的人认为,虽属“枢纽”,但非“总论”;而更多的人认为,虽属“枢纽”,但兼有文体论的性质。后一问题,自范文澜提出之后,至今争论不歇,赞成的和反对的人中都有著名的专家,彼此都曾作出过具体而深入的分析,双方均有所见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^①看来这一问题还会不断争论下去。

参加论战的人中,牟世金是较早提出《辨骚》可以作为“具有兼属‘枢纽’和文体论的双重性”说的代表,后又作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证。^②随后出现的一些著作,大都沿袭此说,例如林杉就把该篇分置两处,且曰:“笔者在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中,曾将《辨骚》篇列为刘勰所论各种文体之首,目的是使其所论具有完整性。本书中则将《辨骚》篇归其本位,使之按刘勰原意,成为他论文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,并贯注于有关写作、鉴赏和批评的论述之中。”^③

① 参看牟世金《文心雕龙研究》第三章《〈文心雕龙〉的理论体系》第三节《〈辨骚〉篇的归属问题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② 参看牟世金《文心雕龙研究》第三章《〈文心雕龙〉的理论体系》第三节《〈辨骚〉篇的归属问题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③ 林杉《文心雕龙批评论新诠》上编《〈辨骚〉第五》,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《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》已于2000年亦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刘勰将一些屈原名篇散入其他文体篇章中讨论, 可证《辨骚》不是文体论的专篇

牟世金还提出了新的佐证,他说:“更应看到的是,刘勰在《乐府》篇说过:‘朱、马以骚体制歌’,他自己已承认‘骚体’了,论者不承认这个事实,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。”这一例证似乎确是不容置疑,反对的人应该承认刘勰的文体论中确有“骚体”。然而我对这一问题仍有疑问。

这里首先就得考察刘勰是如何提出“骚体”一说的。《文心雕龙·乐府》中说:“武帝崇礼,始立乐府,总赵、代之音,撮齐、楚之气,延年以曼声协律,朱、马以骚体制歌……”,前人早就指出,上文实乃袭用《汉书·礼乐志》文,中云武帝“乃立乐府。采诗夜诵,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,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,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十九章之歌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也有相同的陈述。可知这里所说的,是武帝时作郊祀歌等乐府歌曲的事。古来相传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《诗经》,本可配合乐舞演出,内中篇章,例如“风”诗中的作品,本为各地的民歌民谣,因此汉代建立乐府,也广泛吸收民歌民谣,经过最著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润色加工后,再由乐府令李延年配上音乐,用以演奏,供皇上享用。因为天子以四海为家,所以乐府中必须采纳各地的乐曲,汉家天子又起于楚地,所以更为重视楚声。刘勰在司马相如之前加上朱买臣其人,目的也在强调“骚体”的地方色彩。《汉书·朱买臣传》中说他疾歌讴道中,后召见,“言楚词,帝甚说之”,乃得贵显汉朝。《时序》篇中说到“买臣负薪而衣锦”,即用《汉书》本传中意。朱买臣的作品无一传世,并非最著名的辞赋作家,刘勰将之置于突出地位,无非将其作为“楚声”的代表人物就是了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曰:“宣帝时修武帝故事,讲论六艺群书,博尽奇异之好,征能为‘楚辞’九江被公,召见诵读。”此与“言楚辞”之意相合,《汉书》中

的这—名词只是说明其朗读腔调的地方特色而并不具有文体之意。

如以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或先秦散文(诸如史传、哲理等文)相比,人们首先感受到的,可能还是其明显的地域特色。汉武帝在乐府中看重楚声,以朱买臣的作品为代表,正说明这一特点。后人也每先从这些地方着眼进行分析,宋代黄伯思曰:

屈、宋诸骚,皆书楚语,作楚声,纪楚地,名楚物,故可谓之“楚词”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诃、蹇、纷、佗、僚者,楚语也;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,楚声也;沅、湘、江、澧、脩门、夏首者,楚地也;兰、茝、荃、药、蕙、若、苹、蘅者,楚物也。他皆率若此,故以楚名之。^①

刘勰与此不同。他之推崇《离骚》,并不首先强调其地方色彩。尽管他在《物色》篇中也提到:“若乃山林皋壤,实文思之奥府……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,抑亦江山之助乎?”而他在《辨骚》篇中所辨析的,则正是其“取镕经意,亦自铸伟辞”的地方。

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,刘勰虽然提出了“骚体”一名,却不把上述文字放在《辨骚》中申述,只是放在《乐府》中介绍,可见刘勰是把骚体看做乐府中的一个品种,而并不把它视作一种文体。

刘勰在其他地方,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。他在《颂赞》中说:“及三闾《桔颂》,情采芬芳,比类寓意,又覃及细物矣。”《桔颂》为《九章》之一,刘勰如此说,表明他原来就没有把《辨骚》视作一种文体论,所以把《桔颂》放在《颂赞》篇中论述。又如《祝盟》中说:“若夫《楚辞·招魂》,可谓祝辞之组缊也。”明示《招魂》乃《楚辞》中的一篇,而从文体来讲,应该放在《祝盟》中讨论。他在《辨骚》中不去论述《楚辞》中的一些名篇,将之分散到其他文体中去论述。说明

^① 《校定楚词序》,载《东观余论》卷下。

刘勰本来就没有把《辨骚》篇看做文体论。^①

魏晋南北朝时早就形成了“诗骚”传统， 刘勰至为珍视，从而细作辨析列此专篇

刘勰还在其他一些篇章中阐明他的观点。

《明诗》篇中说：“自王泽殄竭，风人辍采，春秋观志，讽诵旧章，酬酢以为宾荣，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灭典，亦造仙诗。”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刘勰是把《离骚》归入诗的行列中去的。《比兴》篇说：“楚衰信谗，而三闾忠烈，依《诗》制《骚》，讽兼比兴。”这也就是说，屈原传承的是《诗》的传统。

《诠赋》篇中说：“至如郑庄之赋‘大隧’，土苒之赋‘狐裘’，结言短韵，词自己作，虽合赋体，明而未融。及灵均唱《骚》，始广声貌。然则赋也者，受命于诗人，而拓宇于‘楚辞’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、《智》，宋玉《风》、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”说明赋这种文体，源出于诗，但得益于“楚辞”的拓展，可知刘勰之论《骚》，始终以之作为文学的一种源头来看待，而不将它局限在一种文体的小范围内进行考察。

何以如此？因为“风骚”已在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坛上形成一种传统，大家已经习惯于“风”“骚”并称，且以继承这一传统为荣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篇“简文称许掾云‘玄度五言诗，可谓妙绝时人’”，刘孝标注引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曰：“自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诸贤，世尚赋颂，皆体则‘诗骚’，傍综百家之言。”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曰：“自汉至魏四百余年，辞人才子，文体三变：相如工为形似之言，二班长于情理之说，子建、仲宣以气质为体，并标能擅美，独映当时。是以一世之士，各相慕习，源其飚流所始，美不同祖‘风骚’。”至于钟嵘之撰《诗品》，将所论的一百数十名诗人一一归之于

① 参看赵永纪《〈辨骚〉篇不属于总论吗？》，《复旦大学学报》，1981年第5期。

“诗骚”的传统之下,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了。

刘勰亦常《诗》《骚》连称,作为文学的源头,由此叙及后世之发展,如《物色》篇云:“《诗》《骚》所标,并据要害,故后进锐笔,怯于争锋。”《练字》篇云:“重出者,同字相犯者也,《诗》《骚》适会,而近世忌同。”又如上引《物色》篇中所说的“屈平所以能洞监‘风骚’之情”,“风骚”亦即“诗骚”;至于不标“诗骚”之名而暗用者,更不一而足,如《物色》中云“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,辞人丽淫而繁句也”。按此说出自扬雄《法言·吾子》篇,可知汉人早就有此见解,刘勰继此续作申述,说明他也继承这一著述传统。

由此可知,刘勰不是首从文体分类的角度去构拟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体系的。刘勰奉儒家诗教为最高准则,叙及诗骚的传统,从而分论二者所衍生的文体与受其影响的各种文体。

他从学术史的角度,关注文学的发展。书中并列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五篇,是为“文之枢纽”,因为这些篇章中论及的内容,决定后世文学的发展,其中也寄寓了刘勰的理想和希望。这五篇文章中当然也有主次之分。前三篇为主,系正面立论,后两篇为次,刘勰于此有所辨析,他将“纬”、“骚”与“经”作比较,区分出了其中合于“经”的一面,也离析出了其中不合“经”的部分,然仍强调其对后世文章发展的影响。刘勰考察古来文学的发展,认为上述五篇文章中提出的许多方面都曾起过重要的枢纽作用。“纬”与“骚”中也有符合“经”的地方,刘勰对之充分予以重视,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定将二者逐出“总论”,而只能仍然称之为“枢纽”,在“总论”与“枢纽”之间区分得那么清楚。

魏晋南北朝时直承两汉而来,前时的影响,仍然巨大而深切。刘勰是魏晋南北朝人,对“纬”与“骚”的影响的感受,自与后代不同。自隋代严禁谶纬之后,这种号称辅经而行的学术才急剧衰退,其后学人方始不易感觉其影响。刘勰之时,“纬”在思想界与学术界仍然风行,在文学界也影响巨大,试观《文选》中录入的南朝及其之前文士的作品,后人注释中,常是引及纬书,即是明证。刘勰对

之必须作出辨析。“骚”从问世时起就是以文学的形态出现的。然而两汉是经学垄断一切的时代,所以一些珍视屈原作品的人,也要傍经而行。刘勰持类似观点,《辨骚》篇中亦称“《骚经》《九章》,朗丽以哀志”;而汉代又有一些人持绝对尊经的立场,坚决拒斥屈原之作享有“经”的荣誉。刘勰要尊经,以之作为裁决文学作品正否与高下的标准,一方面又要维护“诗骚”的文学传统,为楚辞作辩护。作为后起的一名文学理论家,刘勰当然要对二者作出一番抉择,然后分别论述其成败得失。这就说明,吾人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问题,可知刘勰的用意本以《辨骚》为枢纽,与文体论无涉。

刘勰信从刘向关于学术分类的理念, 不把屈、宋及其追随者的作品视作一种文体

下面试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再作分析。

刘勰对汉代文学的成就甚为推许,对汉代学术亦甚关注。《通变》篇中说:

……暨楚之骚文,矩式周人;汉之赋颂,影写楚世;魏之篇制,顾慕汉风;晋之辞章,瞻望魏采。权而论之,则黄、唐淳而质,虞、夏质而辩,商、周丽而雅,楚、汉侈而艳,魏、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,从质及讹,弥近弥淡。何则?竞今疏古,风末气衰也。今才颖之士,刻意学文,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,虽古今备阅,然近附而远疏矣。

刘勰以为商周的“咏歌”成就最为突出,达到了“丽而雅”的完满程度,楚汉已向“侈而艳”的方向发展,然仍未离正轨,所以他要责备那些“才颖之士”,“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”,可知他对汉代篇章仍然赞美。

汉代学人中,他很推崇刘向。刘向不但在创作上卓有成就,在

学术上也卓有建树。上引《通变》篇中，刘勰随后又引桓谭语曰：“予见新进丽文，美而无采；及见刘、扬言辞，常辄有得”，其中“刘”氏即指刘向。因为刘向的学术符合儒家传统的精神，《征圣》篇中说：“子政论文，必征于圣。”而刘向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之一，就在目录方面的分类。《诸子》中说：“逮汉成留思，子政讎校，于是《七略》芳菲，九流鳞萃，杀青所编，百有八十余家矣。”^①自从刘向奉命校书，撰就《别录》，刘歆继起，编成《七略》，班固凭藉二刘余荫，完成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有关中国典籍的存佚兴废，学术源流的分合流变，方始得到了系统的辨析与记载。《时序》篇中赞颂曰：“子政讎校于六艺，亦已美矣。”

刘勰对刘向在学术分类方面的成就，高度重视，而刘向对“骚”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，它与诗、赋的关系，也有明确的意见。《乐府》篇中说：“昔子政品文，诗与歌别，故略具乐篇，以标区界也。”可知刘勰之撰《乐府》专篇，是按刘向的意见处理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承刘向之余绪，把诗归入《六艺略》，把歌归入《诗赋略》；刘勰亦依此意，把诗归入《宗经》中讨论，把歌归入《乐府》中讨论。《诠赋》篇中说：“《诗》有六义，其二曰赋……《传》云：‘登高能赋，可为大夫。’《诗序》则同义，《传》说则异体，总其归涂，实相枝干。故刘向明不歌而颂，班固称古诗之流也。”说明赋本古诗之流，其中一些合乐的诗，流为乐府；其中一些不歌而付之吟诵的诗，又流而为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把文学作品归为“诗赋略”，将屈原及其后学原称“楚辞”的作品二十五篇称之为《屈原赋》，可见刘勰对“楚辞”文学属性的看法，就是从刘向、班固等人的学术分类而来。

《诠赋》篇中还会一一列举此中高手：

观夫荀结隐语，事数自环；宋发巧谈，实始淫丽；枚乘《苑园》，举要以会新；相如《上林》，繁类以成艳；贾谊《鹏鸟》，致辨

^① 刘向校完一书后，即撰一叙录，后又汇编成册，名曰《别录》。其子刘歆将之分类，取名《七略》。其间经过，颇难细说，所以后来有人也将《七略》的作者归之于刘向。

于情理;子渊《洞箫》,穷变于声貌;孟坚《两都》,明绚以雅贍;张衡《二京》,迅发以宏富;子云《甘泉》,构深玮之风;延寿《灵光》,含飞动之势:凡此十家,并辞赋之英杰也。

事实表明,刘勰是把“楚辞”名家宋玉作为“辞赋”首出的重要代表看待的。“辞赋”合称,也就说明楚辞与赋同类,不能把“楚辞”视作一种独立的文体,魏晋南北朝时的目录学家也不把楚辞视作一种文体。

按刘勰之论文体,受挚虞的影响很大。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于《詮賦第八》中曾一一征引前代学人论赋之语,而又以为“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,可以与舍人之说互证”。他在引用挚虞原文之后,又云“观彦和此篇,亦以丽词雅义,符采相胜,风归丽则,辞翦美稗为要,盖与仲治同其意旨”^①。然观挚文,可知彼时已把屈原之作归为赋体。《文章流别论》曰:“前世为赋者,有孙卿、屈原,尚颇有古诗之义,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。《楚辞》之赋,赋之善者也。故扬子称赋莫深于《离骚》。贾谊之作,则屈原俦也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八七引)这里就是辞赋合称,辞已归入赋类,且已组成一词,辞赋成为赋的另一名称。

早在汉初,“辞赋”之说即已出现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载宣帝语曰:“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,小者辩丽可喜,辟如女工有绮縠,音乐有郑卫,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,辞赋比之,尚有仁义风谕、鸟兽草木多闻之观,贤于倡优博奕远矣。”其后辞赋一词应用日广,可觐刘勰之说远有所承。

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李善注引《法言》曰:“或问:‘屈原、相如之赋,孰愈?’曰:‘原也过以浮,如也过以虚。过浮者蹈云天,过虚者华无根。’”(《文选》卷五十)曹丕《典论》曰:“或问‘屈原、相如之赋孰愈?’曰:‘优游按衍,屈原之尚也;浮沉漂淫,穷侈极妙,相

^① 黄侃《文心雕龙札记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如之长也。然原据托譬喻,其意周旋,绰有余度矣。长卿、子云,意未能及也。”(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引)说明汉魏之时早已有人将屈原与汉赋名家归为一类,屈原之作也归为赋体。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:“春秋之后,周道浸坏,聘向歌咏不行于列国,学诗之士逸在布衣,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,皆作赋以风,咸有惻隐古诗之义。”可见汉代的目录学家也将屈原之作归入赋类,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将《屈原赋》二十五篇归入“诗赋略”。^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后,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类似的著述出现,袁山松《后汉书·艺文志》已佚,东汉一代的著作不见著述,也难了解其时学人对文体分类的见解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著作,记载比较系统的,自《晋中经簿》以下,均已散佚。阮孝绪之《七录》,仅存《序》文,见于《广弘明集》卷三,内有《目录》之纲要,《文集录内篇四》中有“楚辞部五种,五帙,二十七卷”。阮孝绪所说的《文集录》,实即班固所说的《诗赋略》。阮氏《序》文中说:“王(俭《七志》)以诗赋之名,不兼余制,故改为文翰。窃以顷世文词,总谓之集,变翰为集,于名尤显,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。”可知自汉代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,至齐代王俭的《七志》、梁代阮孝绪的《七录》,一系相承,在目录分类上变化不大。这也就是说,截至刘勰之时,学术界对学科分类的看法大体上是一致的。

唐初魏征撰《隋书·经籍志》,又将先秦至齐梁时期的典籍加以囊括,分门别类,予以著录。其中有关魏晋南北朝部分,曾将阮孝绪的《七录》作为重要参考书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已改用四部分类,卷四《经籍四》集部中将《楚辞》列于最前端,共录自后汉校书郎王逸注之《楚辞》十二卷(并目录)起,至刘杳撰之《离骚草木疏》二卷止,共十部二十九卷,且作介绍说:

^① 参看朱晓海《“灵均餘影”覆议》,载其赋学专著《汉赋史略新证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。

《楚辞》者,屈原之所作也。自周室衰乱,诗人寢息。谄佞之道兴,讽刺之辞废。楚有贤臣屈原,被谗放逐。乃著《离骚》八篇,言己离别愁思,申杼其心,自明无罪。因以讽谏,冀君觉悟,卒不省察,遂赴汨罗死焉。弟子宋玉,痛惜其师,伤而和之。其后贾谊、东方朔、刘向、扬雄,嘉其文彩,拟之而作。盖以原楚人也,谓之《楚辞》。然其气质高丽,雅致清远,后之文人,咸不能逮。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,旦受诏,食时而奏之,其书今亡。后汉校书郎王逸,集屈原已下,迄于刘向逸文,自为一篇,并叙而注之。今行于世。

这番议论,代表的是南北朝时学术界的共同认识。他们说的《楚辞》,主要指王逸编纂的以屈原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。后出之文,均系“拟之而作”,所以不能算是一种文体;后人所追踪的,主要是《离骚》等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。

由此可知,刘勰的思路与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大体上是一致的。他的与众不同之处,是在《文心雕龙》的枢纽部分重点介绍屈原的突出贡献,将他与其他辞人与赋家区别开来,不将其代表作《离骚》放在文体部分加以叙述,他是在为维护其心目中的《诗》《骚》传统而作努力。

当然,齐梁时期也已有人将“骚”列为一种文体,如与刘勰关系深切的昭明太子萧统,在《文选》中就列有“骚”体一类,内收屈平、宋玉、刘安三人的文章,这与王逸等人编纂《楚辞》的做法一致。而萧统将“骚”类列在“赋”、“诗”之后,“七”体之前,与刘勰等人的做法似乎有所区别,实则这是由于各人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而产生的结果。萧统等人编的是一部总集,势必要把屈原的作品列入,但列入“赋”、“诗”之中都不合适,所以只能单列“骚”体一类,这样安排,自然与刘勰的做法有所不同了。至于后人有将句中夹有“兮”字的作品都称作骚体,也就与刘勰对文体的看法距离更远了。